

十分注意挑选优秀的写刻工匠和校仇好手。在《嘉兴藏》的刊刻初期，密藏大师与冯梦祯等人的书信往来中，经常提及应寻觅书刻高手，称赞徽人刻工黄守言、吴应芝、画工丁云鹏等人的“手笔绝伦”、“难于索习”。而书工徐普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为《嘉兴藏》缮写经板，所写经卷又是如此之多，且又多是社会名流之辈捐资助刻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持刊刻大藏的负责人高度欣赏他的高超的书写技艺。

写刻工匠是古代雕板印刷业的主体力量，也是书籍生产的重要环节。他们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不同的书刻风格，直接影响书籍的质量，也是形成一个时期刻书风格的重要因素，更是考究刻书特点和鉴定板本的参考依据。所以，选择优秀的写刻工匠乃是历代所有官、私刻书家和崇尚典籍的学者们十分重视的问题。在明朝中期，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雕板印刷业突飞猛进，刻书内容广泛，印刷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刻书家、收藏家和校仇、写刻工匠高手。书工徐普便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匠人，他以其超群的书写技艺、从业时间之长久和大量优秀作品传世而著称，成为中国古代雕板印刷史上众多书工中极为典型的代表，是值得尊敬和记述的一位工匠大师。

作者工作单位：故宫图书馆

铁琴铜剑藏书楼名称考略

仲伟行

在我国清代藏书史上，“铁琴铜剑楼”久负盛名，享誉海内

外，其藏书史迹见诸多种史籍记载，为后人所敬仰。今就楼名之缘由作一考证，以正源委。

从前人的记述来看，铁琴铜剑楼名称有三次变化：原名恬裕斋，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避清帝讳改名敦裕堂，1898年更名铁琴铜剑楼。此为《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所载；又如《辞海》等工具书均含糊为“其藏书处初名恬裕斋，后改名‘铁琴铜剑楼’。”至于何时更名，一般传说、转抄为：绍基之子瞿镛酷爱金石古玩，收藏到铁琴一张、铜剑一柄，遂改其藏书楼为铁琴铜剑楼。

据考证：

清道光庚子（1840年）十月朔日，著名学者黄廷鉴（琴六）先生为瞿镛写下“恬裕斋藏书记”一文，文中云：“有斋曰‘恬裕’，其藏书之所也”，并对“恬裕斋”一词引经据典，作了引申释义，盖取“引养引恬，垂裕后昆”之意。此乃原楼名恬裕斋之书证无疑；瞿镛编定之书目《恬裕斋藏书目》，今实物尚存，此乃原名之物证无疑；1987年藏书楼第五世主人凤起先生逝世，在其遗物中发现当年藏书世家用以钞录著述之版印稿纸，墨界十行纸，每行二十八字，版心有“恬裕斋藏版”五字，字样则出于刻工之仿宋字体。其上有瞿启甲（第四世主人）亲笔书写之文稿。此乃恬裕斋楼名之实证无疑。

清同治十三年，翁同和为瞿氏《虹月归来图》题记中云：“夫东南图书之厄……而我邑瞿氏敦裕堂之书独完……”，从那时起，人们知道，恬裕斋已易名为敦裕堂，但另有文章谈及“为避光绪帝载恬讳”故易名。事实上，翁同和题记之时间，与光绪帝即位乃早二、三年，那么所谓避讳之说似乎欠妥。《翁文恭公日记》中有二访敦裕堂之记载，一为同治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二为同治十三年一月初八日。则更说明在光绪帝即位前，就已易名。抑或此“敦裕堂”只在翁书辞中有所更易，乡间小小藏书人家并未着意避讳之事？抑或此为瞿氏之堂名？然而至今未见藏书

印记等印证之。

至于何时命名“铁琴铜剑楼”，值得探疑。“1898年更名”之说，当不属实。

其一：1990年10月，笔者于北京图书馆亲眼见到善本特藏部珍藏四十多年的瞿氏旧藏一铁琴一张，琴衣包袱等均为旧物。另有一横匾（1.8米×0.45米），银杏木质，石绿字，上书“铁琴铜剑楼”五个篆字，落款为：“篆请荫棠师台老大人正画伯渊孙星衍（章）”，可惜无年份，保存完好。如非伪物，则必是瞿氏于解放初与藏书一并捐赠国家的传家之宝。以此匾额为据，考：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官山东督粮道……”（《辞海》）；杨荫深编著、1948年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中国学术家列传》云：“（孙星衍）嘉庆十六年（1812年）引疾归，寻客扬州运署，校刊《全唐文》，又主钟山书院，……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年六十六。……博及群书，好聚经籍，闻有善本，借抄无虚日……”。瞿绍基（1772—1836），字荫棠，清代藏书家，江苏常熟人，1793年入廪贡生，后署阳湖县学训导，颂为贤明之师，及一年辞归。（《常熟市志》）。孙、瞿两家同为江南名士，瞿为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之一，孙与瞿氏之间往来，确是情理之中事，则荫棠大人之匾额题写缘由便有了着落。孙去世早于荫棠先生十八年，由此可见，孙为“荫棠师台老大人”写匾应是1818年前事，故“铁琴铜剑楼”楼名早在绍基在世时便命名了，并非1898年——绍基去世六十二年后才用此名。此匾的发现该说是为长期以来误说正了本，清了源。

其二：《常昭合志稿》有“藏书家瞿子雍（即瞿镛）先生传”，称子雍先生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题其词集为《铁琴铜剑楼词草》。绍基之子瞿镛（1794—1846），字子雍，在其父去世时，已年届四十三岁，可以认定，父子俩为藏书事业共同经

营达二十年之久，其间共同用此铁琴铜剑楼名，也属理所当然。

其三：进一步探讨一下琴与剑之存在时间，更有助于我们辨析。

瞿绍基曾有一首五言诗，题为《琴书悦性灵》，诗曰：“一室琴书古，研摩饮德馨。文垂珠错落，响彻玉玲珑。偶而恬心志，悠然见性灵。朗吟霄月白，终曲暮山青。杖引燃藜火，微移入户星。诵弦饶至味，俗家几曾经。”从中可看出，铁琴早在绍基在世时已经存在了。绍基又有咏剑五言一首，题为《剑化为龙》，诗曰：“宝气腾空跃，丰城书匣逢。谁知腰畔剑，化作水中龙。离合何多幻，雌雄定适从。共惊升碧落，无复淬青锋。飞对寥天阔，冲开骇浪重。延津神物在，何处访遗踪。”此诗写得气势磅礴，寓铜剑于诗情之中，读之令人神往。同时也说明铜剑为绍基在世时已收藏。

瞿镛也曾作《望江南》十首，其中很著名的一首为：“吾庐爱，藏弃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在这首词中，同样反映了琴剑的存在。而后来，关于铜剑，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叶昌炽为《虹月归来图》题记中有“匣中剑气光犹烛”一句看，1878年铜剑尚在。1901年九月十八日邑人徐兆玮日记记载：“……良士（即瞿启甲）云，铁琴尚在，……铜剑已失……。”铁琴一直完好保存，并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捐赠给国家，现藏北京图书馆。

综上所述，铁琴铜剑应于清嘉道年间收藏于瞿氏之手，（相传为唐代制品）由此两件珍贵之物的获得而改其楼名为“铁琴铜剑楼”，当为自然。至于命名时间，应在绍基、子雍父子俩共同在世之时（即1794年后，1818年前）。又因1794年绍基署阳湖县学训导辞归后从事收藏；孙星衍1812年引疾归里，孙去世时，绍基应为四十六岁，与“师台老大人”尚能相称；而子雍于1794年出生，故更大可能是在子雍二十岁左右辞去宝山县学训导归家之

后的1814年，到孙星衍辞世的1818年前的几年中。

其实，前人的室名、书斋名，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是不足为怪的。例如吴郡（今苏州）士礼居主人黄丕烈先生，他的藏书室名见之于题跋者有二十余个，可见，前人按其历史环境的变迁更换室名斋名是比较随意的。在瞿氏家族里，他们有楼名如“铁琴铜剑楼”；斋名“恬裕斋”；堂名“敦裕堂”、“碧梧堂”；屋名“巢云书屋”，还有常熟城内房舍名“东城别业”等等，都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并用。此乃题外之话了。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疏体小议

冯浩菲

从事文史工作的人经常要查阅古书注解资料，同各种训诂体式打交道。遗憾的是，我国的训诂体式到底有多少，如何分类，各种体式都有哪些特点，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至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各种辞书也没有比较全面可靠的介绍。这种状况亟待改善。

疏体是最常见的训诂体式之一。以往学界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一种既解经又解注的训诂体式，似乎只有一种形式，而且出于南北朝，以前没有。这种看法有偏颇之处，不够妥当。我们认为疏体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为讲疏体；一为疏注体；一为条辨体。

讲疏体又称为讲义体、口义体，以疏解原文大意、阐发思想